

大学中国史

论文选读

第二册

江苏古籍出版社

大学中国史论文选读

第二册

洪焕椿 主编

朱宗宙 张 桢 编

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淮阴淮海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16.875 插页 2 字数 360,000

1987年6月第1版 1987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200 册

ISBN 7-80519-041-0/K·17

统一书号: 11354·115 定价: 3.35 元

责任编辑 薛 飞

编辑说明

《大学中国史论文选读》是南京大学、苏州大学、扬州师范学院、南京师范大学、徐州师范学院等五院校历史系根据大学文科教学的需要而选编的参考用书。

选编本论文选读的目的,是为了使大专院校文科学生,主要是历史专业的学生,在学习中国通史时,提供课外参考读物,了解我国史学领域新的研究成果和学术水平,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

论文选编的范围,是1949年以来、特别是近几年来,我国学者在报刊上发表的、密切配合教学的论文。由于篇幅的限制,个别文章略有删节。

为了使学生更好地掌握学术信息,本书每一册中,适当选编一些近几年来有关重大学术问题的讨论综述和研究动态。书末附有建国以来的部分论文目录,以供学习时参考。

《大学中国史论文选读》共分四册:中国古代史的先秦至南北朝为第一册;中国古代史的隋唐至清前期为第二册;中国近代史为第三册;中国现代史为第四册。全书由南京大学洪焕椿教授主编。本册的编者是扬州师范学院朱宇宙、张校同志。

限于经验与水平,不足之处在所难免,热诚希望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编者

1985年10月

目 录

论隋炀帝评价中的几个问题·····	赵云旗(1)
开皇天宝之间人口的分布与变迁·····	胡道修(14)
藩镇割据与唐代的封建大土地所有制···	杨志玖 张国刚(41)
试论宋辽金对峙时期民族关系的几个问题·····	吴 泰(55)
略论西夏的社会性质及其演变·····	陈炳应(69)
南宋对金斗争中的几个问题·····	邓广铭(84)
《元史纲要》结语·····	韩儒林(104)
元代户等制略论·····	陈高华(120)
论元代海外交通的发展·····	陈得芝(136)
试论明代的封建地主阶级及其历史作用·····	许大龄(147)
明代民族英雄于谦·····	吴 晗(173)
读《明史·食货志》札记·····	郑天挺(185)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196)
明清之间中国史学思潮的变迁·····	葛兆光(208)
从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文化到近代新学·····	冯天瑜(250)
康熙南巡与治理黄河·····	商鸿逵(278)
隋唐五代史的文献资料及其研究进展状况·····	吴 枫(298)
建国三十五年来的宋史研究·····	张德宗 郑传斌(319)
近三十年辽金史若干问题研究·····	宋德金(335)
一九四九至一九八〇年的中国元史研究	

.....	• 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360)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讨论的两个阶段.....	• 宋元强(381)
明清史的分期、史料和史学.....	李 洵(417)
建国以来明清史料的整理概述.....	赵守俨(431)
近年来国内清史研究评介.....	佟 辉(452)

附 录:

隋唐宋元明清部分论文目录索引

论隋炀帝评价中的几个问题

赵 云 旗

在隋炀帝的评价中,开运河、建东都、巡幸历来被说成暴政,认为这主要是为了游山玩水,因此,隋炀帝是千古暴君。但根据马克思主义对历史人物思想和活动应进行具体分析的要求和对英雄史观的批判,我们认为这种论断未免笼统、简单。因为历史的发展毕竟有它自己的规律,它的“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而不是由个人主观意志所决定的;社会发展的动力是人民群众的力量,而不是帝王将相的私欲。所以前论只反映了这些事物的表面,而没有从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方面揭示事物“内部的隐藏着的”^①实质;只看到隋炀帝的作为,而没有从其活动的社会条件 and 政治环境中去“考究产生这些动机的原因”^②;只看重了他个人的意志动力,而忽视了“这些动力的动力是什么”^③。因此,本文对有关隋炀帝评价中的几个问题谈一点看法。

关 于 开 运 河

对隋炀帝开运河,很早就有人认为是“出于君王游幸之私意”,“遂为亡国之虐政”^④。直至五、六十年代,仍沿袭此说。但从当时社会实际发展变化看,隋炀帝开运河的直接目的并不是为了巡幸风光。

隋代是继分裂三百余年之后建立的一个统一封建王朝,

巩固全国统一是摆在隋代君臣面前的一个艰巨任务。文帝时很快消除了边患，但江南的形势却一直没有安定下来，彼伏此起的政治事件从未间断。开皇十年，江南土族不肯接受隋的统治，“陈之故境，大抵皆反，大者有众数万，小者数千，共相影响，执县令，或抽其肠，或脔其肉食之”^⑤。隋派杨素征讨，“前后百余战”，反叛虽被平定，但江南动乱的祸源并未根除，“犹有贼首凶魁，逃亡山洞”。亲自平定江南的杨素也明确指出：“余贼未殄，恐为后患”^⑥。而且开皇十六年“萧摩诃子世略在江南作乱”，是一个有力的实证。同时，江南少数民族也不时举众反隋。如开皇十年番禺夷王仲宣反，“岭南首领多应之，引军围广州”。此年“诸俚、獠多亡叛”^⑦。仁寿中“遂州獠叛，邛州乌蛮反，攻陷州城。”^⑧江南土族和少数民族的反叛已给隋王朝带来极大的威胁和恐慌，而开皇末年农民起义又在南方不断爆发。如开皇十七年桂州李光仕反，七月李代贤又起，二十年“熙州人李英林反”^⑨。这就更增加了江南地区给隋造成的忧患，迫使其不得不引起重视和加紧防御。开皇十年，调晋王广“为扬州总管，镇江都”。开皇十五年增设益州和荆州总管，开皇十八年诏曰：“吴越之人，往承敝俗，所在之处，私造大船，因相聚结，致有侵害。其江南诸州，人间有船长三丈已上，悉括入官”^⑩。但隋文帝对江南日益严重的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却作为一份遗产留待隋炀帝来解决。而炀帝时，江南形势继续恶化。“炀帝嗣位，番禺夷、獠相聚为乱”^⑪。“二年，黔安夷向思多反，杀将军鹿愿，围太守萧造”^⑫。“后数岁，黔安首领田罗阻清江作乱，夷陵诸郡民夷多应之”^⑬。大业六年，隋炀帝“宴江淮已南父老，颁赐各有差”^⑭。企图用收买人心的方法加紧对江南的控制。但是，要进一步加强对江南的

控制，开运河就成为必不可少的事了。隋炀帝如此急迫地对待运河工程，说明他早已认识到了江南问题的严重性。由此可见，隋炀帝开运河的直接目的，首先是为了加紧控制江南地区。

隋代强大的中央集权，需要有一个充足的经济来源，然而隋代的经济重心已经南移，但政治中心却不能随之移动。因为隋代面临的主要外敌不在南方，而仍在北方，相反，南亚诸国皆远隔大海，不会给隋造成危害。所以隋王朝在加强对江南控制的同时，还必须把军事力量的重点放在北方。这样，政治和经济重心就被隔裂开来。这不仅使隋政府经济来源受到限制，而且给政治造成很大的不利。隋炀帝要把二者联系起来，巩固隋王朝的统一，必然要开通南北运河。由此可知，隋炀帝开运河的主要目的之二，是为了加强南北联系，充实财政，巩固中央集权。

有些同志据《隋书·食货志》记载，开皇三年时赋税多来源于黄河流域。因此断定经济重心没转移，从而否定隋炀帝开运河的这一重要目的。但是，这时全国还没统一，要征发南方的财富是办不到的。此时赋税主要来源也只能是黄河流域，绝不会跨越长江，所以此说并不能成立。相反，却有史料证明，隋代赋税日益趋向依靠南方。如开皇七年文帝就“于扬州开山阳渚，以通运漕”，准备平陈后转输江南财富。据近年来洛阳考古发现，隋时洛口、回洛及含嘉仓所储就主要是南来的租米。这些正是隋炀帝开运河目的的凝结物。

当然，运河开通后，炀帝多次由此到江南巡幸，能否据此就把巡幸断定为隋炀帝开运河的主要的、甚至唯一的目的呢？我们认为不能。因为运河开通后，马上就成为南北交通的大动

脉，隋炀帝由此南下是理所当然的。而且隋代造船业相当发达，船行比车行既便利，又迅速。再者，隋炀帝大业初，主要精力还在营建东都及附属工程上，兴趣还不在江南。并且隋炀帝曾多年任扬州总管，对江南风光并不是没有欣赏过。他虽然说过“我梦江都好”的话，但须知，此言乃发自大业十二年，并非前期。即使说他爱好江南，但也非人们所估计的那样严重。至于他为何至死不返洛阳，也不是他留恋江南不愿离开，而是势所迫也。当时北方农民起义蜂起，军阀独立纷然，留在他身边的亲信大将也各居心叵测，“是年盗贼蜂起，道路隔绝，帝惧遂无还心”^⑮。最后在无奈的情况下，开始筑丹阳宫，以求最后的归宿。可见隋炀帝并不是留恋江南风光而死于江南，不能据此就说隋炀帝开运河的直接目的是巡幸。

以上证明，隋炀帝开运河是加强中央集权、巩固全国统一的需要，是隋代经济重心南移的结果，是由当时社会条件发展变化而成的。这就是隋炀帝开运河内在的隐藏着的实质，这就是隋炀帝开运河的动力的动力。所以，隋炀帝开运河直接的、首要的目的是在政治与经济上，而不是在巡幸上，即使有这种成分，也是次要的、附属的。

隋炀帝开运河在客观上也具备了条件。我国东部沿海地区自古河流交错，水利方便。这种自然条件为运河的开凿创造了良好的基础。而且炀帝所开运河，或用自然河流，或用前人所开运河。即使如此，隋代运河也非炀帝一朝所开，而是从文帝时就已开始。客观上早为隋炀帝全部结束运河的开凿工程打下了可靠的基础。否则，不论隋炀帝的主观意志如何强烈，也很难在不长的时期里，开通数千里长的大运河。可见隋炀帝开运河，实际上只不过是前人开发的基础上作一些疏通修

理的工作罢了。明乎此,就不会把隋炀帝开运河的消极面估计得那样严重,也就会心平气和地加以认识了。

开运河虽然给广大农民带来沉重的负担,但作为隋炀帝本身来说,还是比较注意节省人力物力的。如所开通济渠,据岑仲勉先生考,汴水本由开封经陈留、商丘、砀山等县会泗入淮,方向是自大梁向东南又折向南呈弧形,途程甚远。但通济渠未取此路,而是自汴河经商丘直接向南经今夏邑、永城入淮,行程较短,工程又分期进行。看来,炀帝在人力的安排上,还是采取了减轻工程对社会生产的严重影响的。在开渠中,人们只注意了使役丁男民夫,但却忽视了炀帝对军队的使用。《资治通鉴》卷181:“诏发河北诸军百万穿永济渠”。利用军队的力量开渠也多少减轻了农民的负担。而且运河开通后促进了南北经济的发展,为国为民都带来很多好处。即使认为隋炀帝开运河是为了私欲的张昆河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按理言之,实皆有利于国家民生”^⑩。唐人皮日休、杜佑对运河造利甚博,也多有论述。至于对唐以后的好处就更不用多言了,开运河利多害少是无疑的。

关 于 建 东 都

对于建东都,世人也皆指责为隋炀帝的暴政,看作是其穷奢极欲的一种表现。我们认为,隋炀帝建东都并不是为了私欲,把它说成是暴政更为不妥。

隋炀帝为什么要建东都呢?他曾在建东都诏中讲到,原因有二:

诏书所言第一个原因,主要指两方面内容。首先在经济条

件上洛阳优越于关中。关中虽称天府之国，但秦川仅有八百里，可耕土地有限；再加上关中自古少蚕桑，丝织业落后。所以关中所产不足以供京师，所织不足以衣兆庶。有隋一代，关中缺粮史不绝书。开皇五年，“令往关东就食”。四年，“隋主以关中饥，行如洛阳，三月而返”。十四年关中大旱，“人饥”^⑧。十五年，“关中户口就食洛阳者，道路相属”^⑨。而洛阳地处关东平原，广阔辽远，物产丰富，粮食充足，其富庶程度，从战国至隋冠于黄河流域。建都于此可解决缺粮问题，使中央集权的财政得到可靠的保证。

其次，在地理位置上关中也不如洛阳。关中偏西北，不仅与全国各地的联系受到限制，更严重的是给政治带来很大不利。如突厥、吐谷浑一内侵，很快就给中央造成严重威胁。而且东北至辽西，东至海，以及广袤的江南，由于远隔京师难以统治，所以许多政治事变都发生在这里。而洛阳位于全国中心，四通八达，既免除了外族入侵对中央的威胁，又便于和全国联系，加强对各地的控制。

关中经济来源主要依靠外地输入。陆路交通不易，水路交通更难。当时中央赋税主要依靠关东和江南，但自东南入河经渭达京的运粮路线是极其艰难峻险的。关中缺粮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照此下去，隋王朝是难以巩固和发展的。以洛阳为都，以上问题就可迎刃而解。所以隋炀帝明确指出，只因关中“关河重阻，无由自达，朕故建立东都”^⑩，此言并不虚发。另外，建立东都也是历史发展的趋势。从汉高祖起，历代帝王无不留意洛阳，但因当时“九州未一”，或“困其府库”而没能实现其目的。至隋，由于经济力量的雄厚，全国的统一，又加之东都经北魏的长期经营，建立东都已成为瓜熟蒂落的事了。由此可见，

隋炀帝建东都是势所致也，其间，首先有着深刻的经济原因。

诏书所言第二个原因，主要是从政治上来考虑的。隋政府为了发展社会生产，一直执行打击士族豪强的政策。而关东历来是士家大族盘据之地，至隋，旧齐境内士族势力还很强盛，因而遭到隋政府打击的程度也较严重，隋代括户政策就主要针对关东士族而制定的。所以关东地方豪族与隋政府有着尖锐的矛盾，大业八年以杨玄感为首的士族豪强反隋活动，发生在关东地区，就是这一矛盾的总爆发。为此，隋炀帝不能不对关东士族加紧统治。而且，汉王谅从开皇十年为并州总管后，“不拘律令”^①，“招集亡命”，“割据旧齐之地”，“多任东人”。炀帝即位，“从谅反者凡十九州”。由于“关河悬远，兵不赴急”，遂使“毒被山东”，“州县或沦非所”。这些对隋炀帝的教训是极其深刻的。汉王之乱虽被平定，但他在这一地区的势力并未清除。从谅“徙者二十余万家”，其中一部分就安置在河南，“并州移户复在河南”。^②所以，对关东地区的控制就更要加强，为此，隋炀帝当然要以洛阳为东都。可见，隋炀帝建立东都的第二个原因也是不无道理的。

隋炀帝建东都，除加重农民负担外，却是一件兴利除弊的事。第一，使京城居于全国中心，减轻了外族入侵对中央的直接干扰破坏，不至于出现唐代那样的窘境。第二，使全国赋税容易汇聚，保证了中央的财政来源，不至于象以前那样往返不安。第三，有利于中央对全国的控制，从而加强了中央集权统一的政治局面。第四，密切了中央与各地的联系，这对隋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都起着促进作用。第五，避免了三门砥柱之险，减轻了农民漕运的痛苦和生命财产的牺牲，节省了漕运的开支以及人力物力的消耗。第六，促进商业发展，东都建

成后,吸引着外国、特别是西域来此经商。东都显然成为全国商业经济的中心,对隋代工商业的发展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由上可知,隋炀帝建东都的主要原因是出于政治、经济上的迫切需要,而不是为了个人的私欲。而且东都的建立有利于国计民生,对此不应全盘否定,指为暴政。若从社会发展角度看,也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件兴利除弊的事。

关 于 巡 幸

隋炀帝巡幸,人们常把它看成纯享受的乐事。认为巡幸江都只是贪图江都风光好而已,后期的巡幸大部分出于玩的目的等等。因此,被指为害民亡国的一大暴政。仔细考察却并非尽然。大业五年炀帝西巡,“行经大斗拔谷,山路隘险,鱼贯而出,风雪晦冥,文武饥馁沾湿,夜久不逮前营,士卒冻死者大半”;十一年幸汾阳宫,“宫城迫隘,百官士卒布散山谷间,结草为营而居之”^②。而且还常遭到外族的抄袭,特别是其年北巡,“突厥始毕可汗率骑数十万,谋袭车舆”。至雁门,“突厥围城,官军频战不利,炀帝恐惧”,将欲冒险突围,后经多方营救方狼狈逃生^③。可见巡幸并非纯享受的事。那么,隋炀帝巡幸不息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隋炀帝执政前期,遵循着文帝的方针政策,是有求治图强精神的。他“夙夜战兢,若临川谷。虽则聿遵先绪,弗敢有坠”,“昧旦思治,欲使幽枉必达”,“用求至治”^④。因此,他经常出巡主要是为了求治。大业元年他下诏巡幸淮海,“今将巡历淮海,观省风俗,眷求谏言,徒繁词翰,而乡校之内,阙尔无闻,恒然夕惕,用忘兴寝。其民下有知州县官人政治苛刻,侵害百姓,背

公徇私，不便于民者，宜听诣朝堂封奏”^⑤。此行乃查贪官，理民情，求得失明矣。大业五年西巡诏曰：“导德齐礼，实惟共治，惩恶劝善，用明黜陟。朕亲巡河右，观省人风，所历郡县，访采治绩”。诏书是否是一纸空文呢？否！就在这次巡幸中，炀帝了解到武威太守（樊）子盖“执操清洁，处淫不渝，立身雅正，临人以简，威惠兼举，宽猛相资”。遂颁诏褒奖，“赐缣千匹，粟麦二千斛”^⑥，号召群臣闻风自励。所以说，炀帝前期巡幸主要为了求治。

隋炀帝巡幸还为了从政治上加强对各地的控制，严查州县谋反乱政的动向，所以巡幸之处，无不是他认为容易生变的地方。他多次巡幸江南，显然与江南形势不安密切相关。接二连三巡幸旧齐境域，这不仅因为中央与此地土族及汉王凉的势力矛盾颇深，而且又因山东河南靠近京畿，所受奴役剥削较重，容易发生农民起义。隋末大规模的农民运动首先在此地爆发，说明隋炀帝巡省此地是有远见的。对于河北的巡幸也同样如此。大业五年巡省河北诏曰：“今安辑河北，巡省赵、魏”，就是调和这里的矛盾，使其保持安定和协。至于巡幸河东，击太行通驰道，就更是为了控制这一长期被汉王凉经营的地方了。要加强对这些地区的控制，又不能刀枪相胁，于是只有用巡幸的方式而抚之。可见，这种巡幸不过是对各地加强控制罢了。

安定边境，防止外患是隋炀帝巡幸的又一目的。炀帝巡幸边塞，主要往返在东北至西北沿线是有一定原因的。西域方面的吐谷浑经常抄掠隋境，至大业四年才被隋击溃，受降之众竟不服隋命。这在隋炀帝看来仍存在着隐患。同时，西突厥还相当强大。炀帝即位，处罗可汗拒不朝贡，后来虽以计臣之，但仍骄横不顺。大业六年炀帝西巡，“其国人不从”，处罗拒不会见。

证明西突厥还能够而且仍想与隋分庭抗礼。隋与东突厥的关系虽好，但也是有矛盾隔阂的。长期任北平襄侯的段文振就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于大业八年上书隋炀帝，认为“戎狄之性，无亲而食，异日必为国患”。建议以时谕遣，“令出塞外，然后明设烽侯，缘边镇守”^②。当时隋炀帝没有采纳段议。后来他多次巡幸启民牙帐绝不是无目的的行动，正是他采纳段议的另一种形式。等他发现高丽与启民私下交往时，立刻怒火大作。这与其说是对高丽使者施加的压力，倒不如说是给启民可汗的一次警告。后来炀帝巡幸为何落到雁门被围的地步呢？是因为启民可汗死，始毕可汗立，炀帝怕形势有变，故再至此。可见，隋炀帝对启民的巡幸说穿了就是监视。

对于边防上存在的各种矛盾，隋炀帝没有视若罔闻，而是见微知著，密切注视。那么达此目的用什么方式最适宜呢？巡幸就是再好不过的了。可见，隋炀帝的巡幸也是加强控制边防的一种形式。

隋炀帝巡幸还决定于他的理论基础。他认为南朝诸帝皆闭守宫闱，不知外情，是其朝代短促的主要原因。所以，隋炀帝于大业五年问给事郎蔡征：“自古天子有巡狩之礼，而江东诸帝多傅脂粉，坐深宫，不与百姓相见，此何理也？”对曰：“此其所以不能长世”也^③。蔡征的话更坚定了隋炀帝的看法，于是他吸取历史教训，对巡幸十分重视。正是有这个思想基础，决定了他巡幸不息。由此可见，隋炀帝巡幸的政治目的是占着重要地位的。

隋炀帝“每出游幸，羽仪填街溢路，亘二十余里”，“照耀川陆”，“旌旗蔽野”。这无疑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对此批判是应该的。但隋炀帝这样做，与政治是不无关系的。因为在封建社会，

专制皇帝的威严对政治发生着很大的影响。众所周知,东晋元帝过江,南方士族皆不理睬,后来王导在一个节日里,请晋元帝坐肩輿出巡,王敦与北方名士都骑马随从,南方士人看到晋元帝的尊严,便陆续归附,使东晋政权得到巩固。这一事实对善于总结这方面经验的隋炀帝不是没有作用的。他在巡幸中大显尊威,无非是借此显示中央集权的强大。他甚至以地方官献食多少为标准,暗测官吏的背向,测验各地的政治气候。可见隋炀帝在巡幸中的任何举动都是有一定的政治用意的。

而且,隋炀帝巡幸也很难说是一件纯坏事,其间是有一定益处的。如他在巡幸中采访善恶,有利于对官吏实行赏罚,加强吏治。其次有利于了解民情,以惩不法,从而维持了安定统一的形势,保证了隋代社会经济迅速繁荣。再者防止了边患的加深与复起,从而减少了民族战争,这对双方都是有利无害的。

由上可见,隋炀帝巡幸并非是求私欲,而是有着明确的政治目的的。巡幸是他巩固中央集权和全国统一的一种措施,所以,对此不应一概否定。

余 论

历来把隋炀帝开运河、建东都、巡幸视为暴政而全盘否定的原因之一,是缺乏全面细致的分析。因为人们议论隋炀帝总是把他指为反面教员,来证实自己对现实问题的看法的。这在唐贞观年间表现尤为突出,太宗君臣为了长保李唐江山,总是从不同方面不同事例反复说明隋亡关键在于隋炀帝是一个仁德不修的暴君,从而对隋炀帝的所为全面加以否定,或抓住一

点不及其余地统统说成暴政。如为了阻止唐太宗大兴土木,就把隋炀帝开运河的消极面渲染得可畏可惧。为了劝说唐太宗不要游猎,就把隋炀帝巡幸的阴影描绘得可恨可憎。用这种方法评论历史、断定是非显然是不科学的。直至今今天,许多人仍然离不开太宗君臣的这种不全面的作法。之二,是因为隋炀帝的这些活动存在着消极面。对此我们认为:积极与消极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这是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所以不容隋炀帝的活动出现消极面是不客观的。试想,历史上哪一个有作为的封建帝王的丰功伟绩不是和“民不聊生”连在一起呢?哪些威震一代的英雄豪杰,有谁不是以光辉与阴影为表里呢?再说,在古代修好一条数千里的运河不付出极大的代价是不可能的。那种要求隋炀帝既要完成这一工程又不许加重农民负担的论点是不合情理的。也许会有人说,隋炀帝这些活动的消极面早已使其积极作用云飞烟消了。我们认为,权衡事物的利弊不等于互相抵销,历史毕竟不是自然科学,历史人物和事件所起的作用有时近在眼前,但有时却远在后世而被人疏忽,有时是公开的直接表现出来,有时是曲折地反射出来。对此只有作具体的分析研究才能见分晓,而不能用简单的加减乘除来计算,更不能象作买卖那样半斤八两来绝对平衡。况且,隋炀帝这些活动的消极面也不一定能抵销其积极作用。如大运河在以后千余年的政治、经济及文化上所起的巨大作用,是参加工程的百余万人付出的代价所能抵销的吗?

总之,我们认为隋炀帝开运河、建东都及巡幸是出于政治和经济上的需要,不是出自个人的私欲。对隋代社会发展有着一定的进步作用,不是纯消极的坏事,即暴政。由此想到,对隋炀帝的评价不是有必要进行再研究吗?